



“那年好险，子弹擦着头皮飞过，十多米外的树干被弹头嵌进一个大洞。”

去年，兄妹们为父亲筹办了90大寿，寿宴上儿孙满堂、热热闹闹。父亲高兴，破天荒地抿了几口葡萄酒，人群簇拥下，他谈起了往事。

那是第一次，父亲向儿孙道出其入伍当兵、进山剿匪的人生经历。他老人家一席话，解开了多年来萦绕我心中的疑惑。原来，父亲那道不愿道出来历的长疤来自剿匪战场。十分惊讶，如此重要的经历，父亲怎能守口如瓶大半个世纪，他身上还有多少回忆和秘密是作为子女的我们所不知的。

父亲寿宴过去数月，这期间我思虑良久，酝酿着对这位耄耋老人的世纪人生进行一次梳理。打定主意后，我带上纸笔，登门拜父，以旁观者的角度倾听并记录父亲的回忆。

文/杨永菊
图/家人提供



上世纪50年代，父亲(右一)与同事合影，肩上的补丁打得左右对称，让人晃眼一看以为是某种时新的样式。



母亲与父亲的合影。

A 6岁私塾 22岁参加剿匪

父亲杨发荣，1928年生于冕宁县先锋乡，虽是地道的彝人，但故乡彝汉杂居的环境让他在那个年代有了接受汉文化的机会。作为家中独子，爷爷在父亲身上倾注颇多，希望他耕读传家，光耀门庭。6岁那年，爷爷从不多的钱粮里抠出一份，送父亲进了当地私塾，在一位史姓老秀才的教导下开蒙。

1950年，国家初立，百废待兴，父亲立志为共和国的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。父亲离开家乡，来到西昌民族干部学校民干班学习。在读期间，接到去金阳县参加剿匪行动的通知，父亲欣然前往，经过军事集训，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进支队。父亲精通彝汉双语，在金阳剿匪期间，小分队翻译、喊话的任务多由父亲负责。

1950年9月，打着“西南人民革命军”旗号的3000余名叛军经云南入境雷波再入金阳县境内，勾结当地土匪，在金阳对坪、梗堡沿江一岸摆开一条长达120余公里的长蛇阵。剿匪形势严峻，战火异常激烈。一次行动中，父亲向着匪兵方向高声喊话，突然，密林中传来一阵枪响，一颗子弹擦着父亲头皮飞过，顿时，殷红的鲜血倾泻而下，染红了父亲的面颊。父亲坦言，那一刻疼痛钻心。

行动持续至1951年初，恰逢大年三十，父亲与战友们在剿匪一线过了年。战斗结束，战友们即将分离，大家围坐一起，缅怀牺牲的战友，回忆并肩作战的日子，依依惜别。

返乡后，父亲继续在民干校学习，后受组织安排，赴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司法班深造，毕业后在冕宁县法院工作。

B 姐姐被狼咬 父亲因工作不能回家

1956年，父亲实现多年的夙愿，光荣入党。同年，民主改革运动在彝区开展，父亲进入民改工作队，前往宁南参加民改工作。当年十月，正在民改队工作的父亲收到母亲来信，信中内容大致为4岁的姐姐被狼咬，伤势严重，希望父亲回家探望。

见信后父亲明白，如果不是情况紧急，母亲绝不会来信催返，因为以往家中大小事务都是母亲一人操持，母亲只会在父亲难得的返乡假期里，对事

35岁有幸见到毛主席……
地道彝人杨发荣，6岁进私塾，22岁参加剿匪，

父亲的传奇往事

姐，更觉得亏欠家人太多。然而刻不容缓的民改工作让他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得回信让母亲多费心，让母亲先借钱为姐姐医治，欠下的钱自己回来还上。就这样，父亲又一次亏欠了母亲，亏欠了家庭。

C 父亲勤俭节约 还有一双巧手

1958年民改工作结束后，父亲被调至西昌地委工作，在民族工作部、统战部等部门任职。有了稳定的工作，父亲总算能时常回家了，那几年母亲脸上多了笑容，我们姊妹四个也感受到了更多的父爱。

每至父亲假期临近，我们总是充满期待，一是想念父亲，二是想象着父亲又会给我和妹妹带来怎样的惊喜。糖果、糕点或是

制带、墨水瓶，总会在父亲的一双巧手上，变成菜筴、背篓、煤油灯。

D 作为凉山代表 参加北京国庆观礼会

1963年国庆前夕，父亲受邀参加全国各民族青年积极分子国庆观礼会，作为凉山代表团的一员，父亲倍感荣幸，高兴得一夜没合眼。

父亲第一次去北京，与各民族青年代表一起登长城，参观十三陵。国庆观礼会上，毛泽东主席到代表团中央，对代表们挥手致意，那一刻，父亲终生难忘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与代表们合影留念。

1974年，母亲重病缠身，父亲卖掉了爷爷传下的一块进口表全力医治母亲，仍没能把母亲从病魔



儿孙满堂，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。

情的处理情况作简单描述。

母亲是坚韧的。父亲长年在外奔波，一年难得回家几趟，如果说“女人能顶半边天”，那么对于我们家而言，母亲柔弱的双肩顶起的是家的全部，生活的不易，早已锻造出母亲坚韧的性格。然而这一次，母亲也慌了神，四岁的姐姐伤势过重，从下颌至面颊，饿狼撕扯的伤口贯穿口腔。镇上的医院无力救治，父亲又不在身旁，母亲只得叫上舅舅，连夜从泸沽镇出发，轮换着把姐姐背到了西昌的医院。母亲在西昌没找到父亲，无奈，只得多方打听父亲所在地，并托人给父亲去了信。

读完母亲的来信，父亲默默流了泪，他心疼姐

漂亮的发饰，父亲回家，从来不会空着手。

然而，父亲对于自己却过分吝啬，别人眼里的国家干部，衣服上却打满了补丁，为了让补丁不那么明显，母亲总是费尽巧妇的心思，或在补丁颜色质地上追求与衣物一致，或将补丁打得左右对称，让人晃眼一看以为是某种时新的样式。打开相册，一张父亲与友人的合照再现了那段历史，照片中父亲穿着洗得发白，打着补丁的上衣，眉眼中满是革命人炯炯的精气神。

父亲手巧，每次步行往返泸沽和西昌总会穿着自己打的草鞋，让挎包里母亲缝制的布鞋不受长途跋涉之苦和泥泞的侵污。别人眼里废旧的铁丝、编

手中夺回，刚满42岁的母亲于当年去世。失去了母亲，大姐挑起了一家重担，供养弟妹，操持家务，把我们供了出来。父亲曾言，我在异地工作难照顾家，对家庭亏欠太多，多亏永惠(大姐)能干，照顾弟妹多年，劳苦功高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父亲被调至刚刚成立的西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任副局长一职，在简陋的工作环境下，父亲兢兢业业，两袖清风，工作数年后光荣退休。

数十年来，父亲就像一颗螺丝钉，哪里需要就钉在哪里，发光发热矢志不渝。然而对于家庭，他有了太多亏欠，幼时的我们或多或少有过抱怨，但如今，这份亏欠我们都能理解。